

杜

詩

釋

地

宋開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杜

詩

釋

地

宋開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杜詩釋地 / 宋開玉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325—3918—0

I. 杜... II. 宋... III. ①杜詩—文學研究②名勝古迹—研究—中國 IV. ①I207.22②K928.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2493 號

責任編輯 顧美華
技術編輯 丁劍瑩
裝幀設計 何 陽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

杜詩釋地

宋開玉 著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5.875 插頁 5 字數 825,0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7—5325—3918—0

K·655 定價: 8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廠聯繫 T: 64063949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出版說明

山東大學素以人文學科見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聞一多、梁實秋、楊振聲、老舍、沈從文、洪深等為代表的著名作家、學者，在這裏曾譜寫過輝煌的篇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以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殷孟倫、殷煥先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以丁山、鄭鶴聲、黃雲眉、張維華、楊向奎、童書業、王仲華、趙儷生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將山東大學的人文學術地位推向巔峰。但是，隨着時代的深刻變遷，和國內其他重點高校一樣，山東大學的文史研究也面臨着尖銳挑戰。如何重振昔日的輝煌，是山東大學領導和師生的共同課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正是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立的，她肩負着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將形成山東大學文史學科一個新的增長點。

文史哲研究院是一個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術機構，所含專業有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中國古代史、科技哲學、文藝學、民俗學、中國民間文學等。主要從事科研工作，同時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知名學者蔣維崧、王紹曾、吉常宏、董治安等在本院工作，成為各領域的學科帶頭人。

興滅業、繼絕學、鑄新知，是本院基本的科研方針；重點扶持高精尖科研項目，優先資助相關成果的出版，是本院工作的重中

之重。《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正是為實現上述目標而編輯的研究叢書。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對出版本叢書的支持，歡迎海內外學友對我們進行批評和指導。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2003 年 10 月

山東大學
文史哲
研究院

2003

序

張忠綱

清人閻若璩有感於“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四庫全書總目》），於是特撰《四書釋地》一書，並且一續、又續，以至於三續，可謂用力勤矣，用意深矣。宋人云：“不行萬里途，不讀萬卷書，不可讀杜詩。”因此，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們在從事《杜甫全集校註》之初，主編蕭滌非先生毅然以七十四歲之高齡，親自率領我們校註組成員，沿著杜甫當年走過的道路，足跡遍及山東、河南、陝西、甘肅、四川、重慶、湖北、湖南等地，對有關杜甫的行蹤遺迹及影響，做了一番實地考察，並寫成《訪古學詩萬里行》一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一九八二年出版。嗣後，有關杜詩地名名勝的現地研究不斷出現。臺灣學者簡錦松先生，更是不遠萬里，數次親赴重慶奉節縣，用現代科學測繪方法，對杜甫在夔州（即今重慶奉節縣）的行蹤遺迹進行了深入的考察，撰成《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一書。但對杜甫詩文中所涉及的全部地名名勝進行全面而系統的梳理和研究，並撰成專著的，至今尚未出現。開玉君不避煩難，殫精竭慮，對杜甫詩文中的近二千地名名勝一一詮釋，撰成大著《杜詩釋地》，洋洋灑灑六十餘萬言，體例完備，考辨詳實，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糾謬辨誤，頗多創獲，較閻若璩《四書釋地》，規模大矣，其功偉矣！

間書“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者十之七八”（《四庫全書總目》）；而依我所審讀，開玉君大著，可據者十之八九，豈不可喜可賀！書成，即將出版，開玉君索序於我，敢不從命？

唐代，特別是盛唐，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為開放的時期。經濟繁榮，國力鼎盛，社會生活豐富多彩，正如杜甫《憶昔》詩所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故而旅遊盛行。旅遊可以飽覽祖國大好河山，開闊視野，增長見識，豐富閱歷，激發靈感。可以說，唐代幾乎沒有一位大詩人沒有漫遊過。詩仙李白“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他從 25 歲出峽漫遊，足跡遍及襄陽、漢陽、安陸、長安、洛陽、洞庭、廬山、金陵、揚州、蘇州、越中、梁宋、齊魯、邯鄲、薊門、幽州、太原、宣城、黃山、當塗等地，寫出了許多傳誦千古的名篇。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描寫了美麗的山光水色和田園情趣。孟浩然一生雖大部分時間隱居故鄉，但亦有著豐富的漫遊經歷。他在《經七里灘》詩中就寫道：“為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五嶽追尚子，三湘吊屈平。湖經洞庭闊，江入新安清。復聞嚴陵瀨，乃在茲湍路。”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描繪了邊疆的奇麗風光和風土人情。詩聖杜甫亦不例外。他年輕時曾有過數次壯游。19 歲有郇瑕（今山西臨猗縣）之游；後有吳越（今江蘇、浙江等地）之遊，歷時四、五年；又有齊趙（今山東、河北一帶）之遊，前後兩次，歷時八、九年，正如杜甫《壯遊》詩所說：“放蕩齊趙間，裘馬頗輕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華州棄官西走後，又被迫“漂泊西南天地間”十餘年，顛沛流離的困苦生活，使杜甫更接近了底層的生活，更深刻地認識了社會現實，也更有充分的時間細緻地觀覽山川風物，致使他的紀行詩贏得了“杜陵詩卷

作圖經”的美譽。

詩歌與自然地理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繫。特定的山川景物、地理環境對詩人的創作都有一定的影響。杜甫早期山水詩大都氣象遼闊，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望嶽》）、“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登兗州城樓》）；在秦州和入蜀途中的山水詩多冷峻峭拔，如“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峽》）、“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鳳凰臺》）、“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木皮嶺》）、“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龍門閣》）、“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劍門》）；成都的山水詩多明媚輕快，如“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春夜喜雨》）、“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之六）、“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山》）；而在夔州所作的山水名勝詩中，詩人常常將雄奇的自然景象與悲涼的身世感慨融為一體，有一種蕭森之氣，給人以沉鬱悲涼之感，如《閣夜》、《白帝》、《白帝城最高樓》等詩。可見自然環境與人文風俗對詩歌創作的影響還是很深的。而杜甫借用地名以抒情達意的藝術造詣也是很高的。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就是顯著的一例。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冬十月，唐軍屢破史朝義兵，收復東京洛陽及河陽，僞鄴郡節度使、僞恒陽節度使降，河北州郡悉平。廣德元年（763）正月，史朝義敗走廣陽自縊，其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並斬史朝義首級來獻。至此河南、河北諸州郡盡為唐軍收復，延續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宣告平息。是年春，流寓梓州（今四川三臺縣）的杜甫聞知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欣喜若狂，遂走筆寫下了這“生平第一首快詩”。詩題即用兩地名，詩正文又連用六地名。全詩雖章法、句法、字法整飭謹嚴，但以律為古，一氣流注，法極無迹，

曉暢自然。作為七律，不僅中二聯對偶，末聯“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亦用對偶，而且使用的是當句對兼流水對的特殊對偶形式。連用四個地名，直寫還鄉之路，累累如貫珠，其勢如飛，其情似火，將飽嘗顛沛流離之苦的詩人“歸心似箭”的驚喜之情，狂喜之態，寫得躍然紙上，宛如目見。而二句之妙，乃在妙手偶得，純任自然，全不見雕琢之迹。此等佳句，在五萬多首唐詩中也是絕無僅有的。至於巧用地名中的數字對，杜詩中更是比比皆是。如“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懷錦水居止二首》之二），“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狂夫》）；“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遊子》），“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送李功曹之荊州》），“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所思》）；“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悲秋》），“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柳司馬至》），“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瞿塘兩崖》），“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詠懷古迹五首》之一），“白帝高為三峽鎮，瞿塘險過百牢關”（《夔州十絕句》之一）等等。杜詩的地名藝術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

文因景成，地借文顯。泰山的雄偉壯麗，若無杜甫“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望嶽》）這樣的藝術概括，難以顯示出它“一覽衆山小”的氣派。而一些不為人知的無名之地，一經詩聖杜甫寓居或題詠，頓成名勝，流傳千古，惹得後人爭相拜謁。杜甫居住的“草堂”之多，恐怕無人與其比肩。最著名的是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早已成為人們瞻仰的聖地；而其他地方的許多草堂，真真假假，讓人難辨，真是處處有情留詩聖，詩聖留處成名勝，我們真是應該感謝我們的詩聖杜甫的。

開玉君是我的同事，相處多年，又從我編纂《全唐詩大辭典》和《杜甫大辭典》，深知他是一位勤奮做學問的青年學者，很

有發展前途。我殷切期望他能在《杜詩釋地》的基礎上，對杜甫運用地名的藝術和地域因素對杜甫創作的影響，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再寫出另一部有關杜甫的大著來！

2004 年 10 月於山東大學耘齋

前 言

杜甫(712—770)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第一流的詩人。他的前半生是所謂的“開元之治”的唐王朝極盛時期，從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唐王朝進入了由盛而衰的轉變階段，杜甫也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其後半生即在安史之亂、外族入侵、軍閥交征的戰亂生活中度過。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杜甫生於河南鞏縣(今鞏義市)一個具有悠久儒學傳統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預以下，幾乎每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職，杜甫自豪地稱為“奉儒守官，未墜素業”(《進雕賦表》)。他的祖父杜審言，武則天朝曾官膳部員外郎，是位著名的詩人。父親杜閑，做過兗州司馬、奉天縣(今陝西乾縣)縣令。杜甫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養，“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讀書破萬卷”(《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壯遊》)。壯年南遊吳越，北遊齊趙，結識了詩人李白、高適等名流，自言“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杜甫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未能及第。天寶五載(746)，入京都長安。六載，再次應制舉，仍然落第。天寶九載(750)冬，向玄宗投獻《三

大禮賦》，得玄宗賞識，命他待詔西京大明宮集賢院，由宰相李林甫出題考試他的文章，集賢院的學士們都來監考，所謂“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莫相疑行》）。但終因權臣阻撓，個人抱負未得施展，四年後才得授河西尉的微官，不就，改授太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天寶十四載（755）冬，安史之亂爆發，次年安史叛軍攻陷長安，玄宗倉卒逃往蜀中，太子李亨即位靈武（今屬寧夏），是為肅宗。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經歷了逃難、陷賊的苦難，潛赴鳳翔（今屬陝西），投奔肅宗，授左拾遺。不久，又因疏救獲罪罷相的房琯，觸怒肅宗，詔三司推問，幸得宰相張鎰救免，旋被放歸探親。肅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貶為華州（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二年秋，杜甫棄官西去，寓居秦州（今甘肅天水市）、同谷縣（今甘肅成縣）。因生活困頓，當年冬天，遠赴成都。上元元年（760）春，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營建草堂，開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代宗寶應元年（762）七月，嚴武奉召入朝，杜甫送至綿州（今四川綿陽市），因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叛亂，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臺縣）、閬州（今四川閬中市）。廣德元年（763），召補京兆功曹，不赴。廣德二年（764）正月，嚴武再為劍南節度使，重鎮蜀中，寫信要求杜甫留下。二月，杜甫攜家離開閬州，三月，回到成都草堂。六月，被嚴武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代宗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辭出嚴武幕府。五月，離開成都順江東下，經嘉州（今四川樂山市）、戎州（今四川宜賓市）、渝州（今重慶市）、忠州（今重慶忠縣）至雲安（今重慶雲陽縣），次年夏初遷居夔州（今重慶奉節縣），居住夔州近兩年。大曆三年（768）初春，杜甫離開夔州，經過峽州（今湖北宜昌市），三月，至江陵（今湖北荆州市）。秋，移居公安縣（今屬湖北）。暮冬，抵達岳州（今湖南岳陽市），泊舟

岳陽城下洞庭湖中。四年春正月，杜甫自岳州進入湖南，先後輾轉衡州（今湖南衡陽市）、潭州（今湖南長沙市）。五年冬，杜甫離開潭州沿湘江北歸，病卒於湘江舟中。

杜甫十分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曾說：“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嶽麓山道林二寺行》）青年裘馬輕狂時，曾經北至晉中，南達吳越，“亦有梁宋遊”（《贈李白》）、“放蕩齊趙間”（《壯遊》），中年困守長安，晚年穿越秦隴、輾轉巴蜀、飄泊湖湘，一生足跡遍歷大半個中國，凡是他經過的山山水水，在他的詩作中都有生動的描寫。他既有氣象恢弘的早期山水詩，也有冷峻峭拔的秦州詩和入蜀詩，而成都山水的明媚秀逸、夔州江峽的險奇雄壯、湖湘風雲的莽蒼鬱蒸都在他的詩歌中表現出來。他將自己所見所聞的萬方多難的社會現實、所感所歎的民怨國恨與時刻繫懷的輔君中興的個人抱負，用詩歌記載下來，讀其詩，如同讀一部反映唐王朝由興轉衰的歷史畫卷，唐人孟榮《本事詩》云：“杜（甫）逢（安）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清人浦起龍說：“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肅宗、代宗）之事寄焉也。”（《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

杜甫的遊歷行蹤研究歷來是杜甫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杜詩學界將杜甫一生作品分為“壯遊詩”、“長安詩”、“秦州詩”、“蜀中詩”、“夔州詩”、“湖湘詩”等時期，祖國的高山大川，在杜甫的詩文中多有反映，“山川城郭之異，土地風氣所宜，開卷一覽，盡在是矣！”（宋劉克莊《後村詩話》新集卷二）所以宋人林亦之《奉寄雲安安撫賈文少卿林黃中》詩有“杜陵詩卷作圖經”的讚歎。考察杜甫詩文地名名勝，是我們考索杜甫遊歷的一個直接而有效的途徑，也是我們研究杜甫詩歌及其思想的重要途徑。古今杜詩研究者向來都很重視這項工作，舊註、雜考在這方面用

功至夥，而系統的研究則始於 20 世紀 20 年代陳鳴西的《杜詩地名考》、《杜詩地圖十幅》（《文學叢刊》民國十八年），近年來，有關杜甫詩文地名名勝的考察和解釋工作又逐漸展開，且方興未艾，但總的來說，系統的研究成果並沒有產生，在有關杜詩地名的研究中錯謬之處也時有出現。如《秦州雜詩二十首》之一：“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山東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杜甫詩選》註曰：“魚龍：川名，今名北河。鳥鼠：山名，在今甘肅渭源縣。兩者都是去秦州途中的實際地名。”（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年）增訂後的《杜甫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註與此同。這些註都本於蕭滌非《杜甫詩選註》（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蕭註曰：“魚龍，川名；鳥鼠，山名，皆在秦州。”實際上，魚龍川即汧水（今名千河）中下游的一段。汧河為渭水支流，發源於甘肅六盤山南麓，中下游東南流經陝西省隴縣（舊為汧縣）、汧陽縣（今名千陽），在寶雞市注入渭河。《水經注·渭水上》：“汧水入（渭水）焉，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為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為汧。’汧之為名，實兼斯舉。水有二源，一水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其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為靈而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為魚龍水，自下亦通謂之魚龍川。川水東徑汧縣故城北。”鳥鼠山，又名鳥鼠同穴山、青雀山，在今甘肅渭源縣。《尚書·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即指此。《水經注·渭水上》：“渭水出隴西首陽縣（今渭源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新唐書·地理志四》：“（渭州隴西郡）渭源，高宗上元二年更名首陽，於渭源故縣別置渭源縣。儀鳳三年省首陽入渭源。有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從以上考察我們可以看出，鳥鼠山在唐渭州（天寶中曾改稱隴西郡）；舊注所說的北河，發源於今甘肅省定西、通渭兩縣間，向北

匯祖厲河注入黃河，是黃河支流，距離千河流域有數百里之遙。唐肅宗乾元二年（759）秋，杜甫自華州（今陝西華縣）棄官攜家赴秦州（今甘肅天水市），從鳳翔以後，正是沿千河流域的千陽、隴縣，出大震關自隴州到達秦州的，因此，魚龍川確實是杜甫赴秦州途中的必經之地，但北河、鳥鼠山皆在秦州西渭州境內，舊註認為“兩者都是去秦州途中的實際地名”是錯誤的。在當時“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的艱難困苦“遁逃”中，飢寒交迫的杜甫決不會繞道距今陝西千陽、隴縣以及甘肅天水市皆有數百千里之遙的北河流域，然後西南走秦州之西的渭源縣再折而進入秦州地區。另外，蕭滌非先生認為魚龍川、鳥鼠山“皆在秦州”，也是錯誤的。魚龍川為汧河流經陝西西部隴東地區的別稱，《舊唐書·太宗紀下》：“冬十月壬辰，幸隴州，曲赦隴、岐二州，給復一年。辛丑，校獵於貴泉谷。甲辰，校獵於魚龍川，自射鹿，獻於大安宮。十一月甲子，至自隴州。”可見魚龍川在隴州，唐代屬關內道，而鳥鼠山在渭州，唐代屬隴右道，皆不在秦州。杜甫在詩中以“鳥鼠秋”對“魚龍夜”，以想像旅途對實際經歷，只在於說明行程之遼遠，跋涉之艱辛，舊註不解詩人地名使用的巧妙，妄加揣度，不僅影響了對杜甫遊歷行蹤的瞭解，也影響了對杜甫及其詩歌的研究。

本人開展的這項工作，就是為了在杜甫詩文地名研究方面做出自己的探索，本書研究涉及到的主要內容包括：杜甫生前遊歷過的地區的地名和名勝古跡；杜甫沒有遊歷但在詩歌中吟詠到的地名和名勝古跡；後人為杜甫而建的紀念性名勝。

杜甫詩向來有“詩史”之譽，其詩文中的地名，或紀行蹤，或詠古跡，或引典故以說明時事，不僅著名的“三吏”、“三別”、《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是如此，其《八哀詩》也可以當作“安史之亂”前後唐王朝一些重要卿相將領的行狀來看，如《贈司空王公

思禮》一篇，“東夷”、“幽薊”點出了王思禮的出生地和出身，“流沙”、“青海”、“天山”、“九曲”、“潼關”、“朔方”、“梁益”、“鳳凰山”、“涇渭”、“金城”、“太原”、“汾晉”可以讓我們瞭解到王思禮的行伍經歷和建功立業的艱辛，也將唐王朝邊境征戰地和平定“安史之亂”的主戰場串聯起來。另外，“九曲”引入哥舒翰欲斬思禮、“清河”引入房琯向唐肅宗進諫解救思禮，則更是交待了王思禮生平中的兩件大事。同時，本篇還從側面反映了唐王朝與吐蕃既和親又摩擦的關係，唐肅宗即位靈武前後的政治局勢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說明。一篇之間，揭示了衆多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縱橫捭闔，波瀾起伏。因此，片面的地名考索並不能完全反映杜甫詩文地名使用的深意，本人在寫作過程中，著重對具體詩文地名的箋註和分析工作，除說明其地志的演變外，也聯繫杜甫寫作的時代特點和個人經歷，盡量做到既考明其地，又註知其用，以求對考察杜甫行蹤、理解杜甫詩文、研究杜甫思想有所幫助。

杜甫《重過何氏五首》之二有“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之語。《新唐書·地理志一》、宋宋敏求《長安志》卷十二、《太平寰宇記·關西道一·雍州》皆謂本翠微寺本唐太和宮，高祖武德八年(625)置為行宮，太宗貞觀十年(636)廢，二十一年(647)復置，改稱翠微宮。憲宗元和(806—820)中捨為翠微寺。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註》根據杜詩認為諸史傳所載是錯誤。我們通過細考文獻，發現唐詩中吟詠翠微寺的作品較多，與杜甫同時或稍早的有孟浩然《題終南翠微寺空上人房》、李白《答長安崔少府叔封遊終南翠微寺太宗皇帝金沙泉見寄》諸詩，著名僧人道宣於高宗乾封二年(667)所撰《關中創立戒壇圖經·戒壇受時儀軌第九》也提到了“終南山大翠微寺”，可見至晚在高宗初期翠微宮就已經捨為佛寺了。《全唐詩》卷七百八十四引《談苑》

錄唐驪山遊人詩：“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臺幾十重。天子不來僧又去，樵夫時倒一株松。”雖稱翠微寺在驪山是錯誤的，但可以說明，翠微寺在唐末已經荒廢。通過開展杜甫詩文地名名勝的考察，我們可以藉此修正很多有關史料典籍的記載錯誤，此項工作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杜甫詩文地名的研究，文獻的考索與現地考察相結合的途徑是十分有效的。過去的研究，多注意對文獻的考求，儘管真知灼見迭出，但總有囿於文獻和個人見識而出現的問題。現地的考察、身經目驗是非常重要的。1982年，蕭滌非教授率領山東大學《杜甫全集》校註組，沿著杜甫當年走過的道路進行考察，出版了《訪古學詩萬里行》，開創了杜甫詩地名名勝現地研究的新方法。近年這方面的成果也不斷出現，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李濟阻等《杜甫隴右詩研究論文集》等著作都有突出的成就。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們也曾經到杜甫生活和遊歷過的一些重要地區如洛陽、長安、成都、重慶及湖湘地區進行過實地考察，特別是對那些僅就文獻資料不能解決的疑難問題，更是借助現地考察的力量。即使條件不允許，我們往往用通訊的方式與當地有關部門和學者進行探討。

就編寫形式而言，對專人專書的地名研究，目前已有多種成果可以參考，但對杜甫詩文地名而言，由於杜甫足跡遍歷祖國的東南西北，凡是他經過的地方，在他的詩作中都有吟詠，同時，他在某一時地的作品中所涉及的地名名勝，並不集中於其地，因此，按照詩人遊歷順序編排內容比較困難。而以辭典的形式列出詞目，對於讀者查索是十分方便的，但往往不能準確說明杜甫具體詩文中對某一地名名勝使用時的具體含義。本書的編寫體例，按杜甫詩文繫年在每一詩文下對地名名勝展開箋釋，這是一個大膽的探索。